

《第九个寡妇》中的人道主义关怀

张密密

瑞昌中等专业学校

摘要：《第九个寡妇》是严歌苓呕心沥血的作品之一，作品中展现的下层人民的生存困境及在困境中显示的人的本质，对顽强生命的歌颂，在生存困境下仍然执着于对自由的追求，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仍然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严歌苓；人道主义；王葡萄；《第九个寡妇》

【DOI】 10.12252/j.issn.2096-627X.2022.01.080

引言

《第九个寡妇》是严歌苓转型时期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小说描写了在国家历史的大背景下，史屯村民在历史的洪流和自然的考验中为生存而不断挣扎与抗争，生动展现了人性中的善与恶，谱写了史屯村人的一代史诗。主人公王葡萄一直是一个不被外界环境所影响的独行侠，每一次中国政治局面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给史屯村带来的冲击，她总会用一种孩子般的、简单的思维去看：葡萄从关着的门缝里，看那些腿就像正月十五的灯会。以她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生活着，对他人的劝说和威胁一直不放在心上，她有自己的一套行事方式，同时又以一个七八岁的孩子的视角观察世界，以稚嫩的眼光看待中国20世纪40年代~80年代历史的变迁。而对生命中陆陆续续出现的男人也是如此，凭借着自身的本能与他们产生纠葛。对于王葡萄来说，无论世事安泰还是风起云涌，那些村民和外来者做的事也都是一场场闹剧，都是过眼云烟，而她则专心过自己的日子，好好隐藏和照顾公爹。

一、生存的赞歌

严歌苓在《第九个寡妇》中关于如何生存有过许多细致的描述，从中可以看出严歌苓对人的生存问题给予了很大的关注。许多学者对严歌苓《第九个寡妇》中的生存问题一般是围绕小说中人物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即马克思主义生存哲学的“为我而存在”，如王葡萄和村民关系，王葡萄与公爹的关系，王葡萄与男人之间的关系，未能跳出文本局限，须进一步探讨。因此，笔者将从个人和集体生存角度出发，进行对比，体现个人生存的意义和严歌苓对个人生存的关注。

一方面，中国一直提倡集体主义，强调合作意识，有“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众人拾柴火焰高”“团结就是力量”等俗语或标语。集体的生存同集体主义一样深深扎根在中国的土壤中。于是，对个人的生存和

命运的关注就微乎其微，个人甚至可以为集体而奉献牺牲。严歌苓前期也写了有关家国命运的作品如《金陵十三钗》，十三个风尘女子，为了国家大义不惜牺牲。他们站在国家生死存亡的立场上勇于献身。但是那十三个女子最后的命运如何，谁也不知道。《第九个寡妇》中王葡萄的公爹被划为“地主恶霸”，家产被侵占，是大多数村民集体决定的结果。除了葡萄，没有人真正关心过孙怀清个人的命运。为响应国家号召，集体把稻子当“火箭”放上天，得到一个先进公社的荣誉。

另一方面，与集体生存相对的就是个人的生存，在集体生存的光环下，个人的生存和个人的命运显得渺小，甚至不存在。但是在严歌苓笔下，个人的命运永远比集体的命运更重要。《第九个寡妇》中的主人公王葡萄在生活上过着她自己想过的日子：开会，养猪，看热闹，扯皮，打趣，也从来不吃亏。那些阶级概念，新旧势力变更从来没有被她记下来，她只会说：“哦，沦陷了”“哦，又打起来了”。在葡萄眼中，无论世事如何变化以及历史如何变迁，人都是需要生活和生存的，这个是永远也改变不了的。葡萄对在史屯来来往往的旧人们和新人们都不甚在意，一心守着自己关心爱护的人。在一次访谈中，严歌苓说：“男人总是去打，女人总是说‘打什么’就像在王葡萄眼里，来来去去都是腿。在她这样毫无政治概念的女人眼里，谁正确、谁打赢，几十年后，都没有意义”。唯一重要的是如何在这些动荡的世事中生存下去。在葡萄眼里，生命大于天，任何事情都比不过一个“活”字，只有生存并且活下来才是最基本的。波澜壮阔的历史也无法阻挡葡萄活下去的希望。

枪毙幸存下来的孙怀清被葡萄救回家后没有放弃活下去的希望，虽然有一段时间离开葡萄，自己到其他地方去生活。这也是为了自己能够更好地生存下去，同时希望自己不成为葡萄的累赘和不耽误葡萄的终身大事。

闹饥荒时期，史屯村民剥榆树皮吃，李秀梅为了一截榆树枝和史修阳的媳妇拉拉扯扯。实在忍受不了饥饿的村民们又去耐火材料厂把白土运回家当做烙饼吃。他们为了生存，使出浑身解数，充满智慧与力量。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躲过了天灾和人祸，延续了生命，激发了人的潜能。

在对集体命运的关注下，个人的命运显得无足轻重，但是严歌苓写的《第九个寡妇》则是关注在自然与政治考验下的个人的命运和个人的生存。国家的政治动荡只是为个人提供了一个舞台，是为了展现巨大的生命力和坚强的毅力，以及毅然承受和包容所有的苦难和艰难的精神。不管经历多少苦难，人都要生存下去，这是一个人存在的最基本的价值和意义。这也是严歌苓对生命的尊重，同时也体现了严歌苓对现实生活中由于经济的发展，有些人丧失了人性和抛弃道德的现象的鞭笞和表达不满。许多作家对于苦难的描写大多都是描摹出一幅幅惨不忍睹的苦难景象，借以衬托条件的艰苦，目的在于表现批判，无奈，绝望。而严歌苓除了有其他作家对苦难共同的表达外，对困难的描写则更多的是为了用来展现绝境下人的顽强的生命力和坚韧的力量，歌颂人伟大的生命力。

二、人性与伦理的和諧

人性与伦理经常产生矛盾冲突，而作家在作品中怎样把人性与伦理调和得相得益彰就显得尤为重要。《第九个寡妇》通过人性的真善美以及中国儒家传统家庭伦理思想的团圆观念，体现严歌苓对人的命运在人性与伦理的矛盾中的调和的关注。旅居海外的严歌苓看到了现实世界太多的不合理与缺憾，但是并没有绝望放弃，仍然相信人性中存在着善良的一面，并且通过自己的作品表达出来。

一方面，《第九个寡妇》描写人性的真善美不但从主人公人性的善良和纯真出发，还通过描写其他人人性的隐忍、冷漠来反衬。展现了人性的复杂但又最终趋向美好的一面，使小说的人道主义思想更深刻，进一步体现了严歌苓对特殊历史时期下的人的关怀和赞美。这么一个不谙世事，如六七岁小孩一样的王葡萄在那个动荡的时期能够生存，并且把被枪毙的公爹救回来藏在自家的红薯窖20余年确实是个异数。严歌苓在谈到这部小说时也曾说：“她从最首先、最本质的层面上来判断，我的父亲是一个好人，我得救他”。葡萄有一套自己的人

生价值观：世俗，舆论都比不上她的公爹重要。并且从未因他人的威胁逼迫而改变和妥协，只要她认为是对的就去。无论葡萄做什么，大家都能找出理由原谅她，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葡萄神经不大正常，谁会和一个神经不大正常的疯子计较呢？公爹对于葡萄来说，是养育她的恩人和亲人，在葡萄的眼里，公爹什么事情也没有做错，他勤劳能干，精明，充满智慧，帮助葡萄度过了饥荒，教葡萄养猪，这也正是人性美好的一面所散发出来的光辉。生存的困境的折磨和中国政治的动荡的重压，也没有消磨她纯真，善良，宽容的人性，也一直用包容的心态去面对各种考验和磨难。这是严歌苓对乐活、积极向上的生命的追求和对人性的真善美的歌颂。

孙怀清被葡萄藏在红薯窖的时间越久，被发现的可能性越大。最终被李秀梅的儿子无意中发现，其次就是李秀梅。渐渐地，全村人都发现了这个秘密，但是谁也没有戳破，外乡人来打听的时候大家都缄口不语，只知道葡萄有个舅姥爷，史老六甚至让葡萄给他送猪尾巴和猪奶子。小荷也通过葡萄给他送烧鸡。中国几十年的变迁，史屯村的人们经历了许多的苦难，绝望，死亡。在极致的环境下，他们激发了人的潜能，而人的本质在这些苛刻而恶劣的条件下暴露无遗，人的劣根性和人性的真善美先后被展现出来。在经历了一场场政治运动过后，那些疯狂过、仇恨过、相互嫉妒与倾轧过的他们重新回归了平静、祥和，也本着内心的善相互帮助和相互扶持。

“出国以后，有了国外生活的对比，对人性有了新的认识……会把善恶的界限看得更宽泛一些。”严歌苓对个人人性的善恶有了深层的理解，采用平和的叙事方式去关注个人，关注人性，力图展现人性的美好，对人性的挖掘也融合了中西方思想。在王葡萄身上，我们能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乡土人情的美好，同时也能发现她也有西方世界人道主义的博爱精神。

另一方面，中国“五四”运动时期，许多人强调学习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予以批判，他们认为中国封建思想和专制主义是残害人的东西，其中就包括了家庭伦理思想。如巴金的《家》以激进的风格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对人的残害和扼杀。对中西方家庭伦理文化进行比较就会发现，西方人由于受到文艺复兴时期人道思想的熏陶，对于自由的追求远远高于生命生存、爱情、婚姻，对人伦道德，家庭的观

念是比较浮浅。而中国的儒家文化，其中就有一部分思想就强调“孝悌”，强调家庭伦理。华裔作家严歌苓在《第九个寡妇》中描写的家庭伦理观念和中国“五四”运动时期的学习西方，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有矛盾之处。其实，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严歌苓旅居海外后，深刻体会到西方人对家庭观念的淡薄，中西方对家庭观念的差异使严歌苓感到严重的缺憾和无奈。因此，严歌苓写作的叙事视角显得更为复杂，但是这都离不开严歌苓对人的存在意义的探寻和关怀。虽然严歌苓继承了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但并没有沉溺于中国传统封建思想中的“三纲五常”。而是在吸收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精髓后，结合自己在海外的经历与学习，塑造了一个融合中西方思想、特性更为复杂的形象。王葡萄的家庭伦理观念向我们展现了人性的淳朴，善良，坚韧。也使得严歌苓笔下的人物更具魅力。

王葡萄把公爹藏在地窖二十余年，用严歌苓的话来说是“天伦”上的知觉，事实上，这种“知觉”是存在于中国人思想中的关于人伦道德，家庭伦理的观念。王葡萄救出公爹孙怀清，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和生命大于天的观念。也是中国传统道德上关于家庭的团圆的情感体验，而这种体验正是身居海外，曾经孤独漂泊的严歌苓一直渴求和期盼的。同时也突出了人性与伦理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人性不允许孙怀清存活，另一方面幸存下来的孙怀清是史屯的村民的邻里乡亲，也是葡萄的亲人，基于道德的认知，村民要善待孙怀清。

严歌苓塑造的王葡萄形象是她对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继承和对自己精神的追求的回归。同时也清晰地呈现了严歌苓对中国特定时期下鲜活生命的赞叹和对曾经遭受过苦难的人的同情，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愿望，也是对生命在困境当中的反思。而其他作家对这种“底层人物”的书写，展现在大家面前的大多是一些经历了许多苦难的形象，或者展现许多苦难的景象。严歌苓却不一样，她更倾向于用平和的笔触描绘自己笔下的人物，善于挖掘和追寻人性中的真善美，把人性中的真善美以最原始的状态展现给大家。因此严歌苓也更加关注人的命运，使得她笔下的形象在与命运和困境的抗争中更熠熠生辉。

描写一个无忧无虑，敢于追求自由，同时又闪现儒家家庭伦理思想光辉的葡萄，与严歌苓对作品中人物的

身份认同感，实际上也是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感是分不开的。移居国外生活二十余年的严歌苓遭到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刁难和歧视是很多人无法想象的，在那个宣称自由和民主的社会里，能享受到真正自由和民主的只有一部分人。严歌苓的事业和家庭、爱情都接受了严峻的考验和一系列的打击，作为旅居海外的华人作家，人生充满艰难，希望能找到灵魂的归宿，而写作为她提供了灵魂栖息的场所。

结束语

王葡萄身上呈现出来的包容，宽恕，怜悯的特性，和对自由的追求以及慈母般的容纳一切的美德，也是严歌苓所追求的。严歌苓描述的是一个以河南乡村为背景的有着纯正的河南腔的寡妇王葡萄，但是王葡萄形象却有西方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子。作为早期移民的华侨作家，在国外有意识的接受西方思想的熏陶，意识形态产生改变，以及身份认同的隔阂。使她虽然离开了国土，但还没有真正融入新的环境，因此严歌苓的许多作品既吸收了西方人道主义思想，又有对中国儒家文化的继承，也使得她笔下的形象复杂且特别。

中西方意识形态的不同，使融合了中西方文化的严歌苓的叙事视角更加独特，严歌苓站在一个独特的，自由的角度书写历史，挖掘人性。她认为现实生活中的人们都活得十分被动与无奈，而作品中的人物才是她能够自由自在地说真话的对象，《第九个寡妇》中的王葡萄就是严歌苓能够自由说话的对象。

参考文献

- [1] 严歌苓. 第九个寡妇[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2: 41, 2, 165.
- [2] 张琳. 人性的赞歌——从人道主义立场解读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N]. 赤峰学院学报, 2016, (10): 148, 149.
- [3] 李红朵. 跨文化视野下的严歌苓小说人性书写研究[D]. 保定: 河北大学, 2015: 5, 11.
- [4] 曾晨. 萨特存在主义视阈下的严歌苓小说——从扶桑、王葡萄到多鹤[J]. 《名作赏析》, 2015, (15): 97.

作者简介: 张密密(1993-), 女, 江西九江, 汉族, 大学本科, 中学二级, 瑞昌中等专业学校。